

水神

中国运河



胡梦飞
著

山东大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 (2017M612249)

聊城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321051519)

中国运河水神

胡梦飞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运河水神/胡梦飞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8. 11
ISBN 978-7-5607-6244-9

I. ①中… II. ①胡… III. ①大运河—神—信仰—研究—中国 IV. ①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88616 号

责任编辑:张瑞

封面设计:张荔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济南新科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6.75 印张 274 千字

版 次: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前 言

中国大运河由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组成,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 8 个省市,全长 2700 公里(含遗产河道 1011 千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较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的运河。2014 年 6 月 22 日,中国大运河在第 38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 46 个世界遗产项目。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大运河的主体部分,也是通常意义上我们所说的“大运河”。它北起北京,南达杭州,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 6 个省市,全长 1700 余公里。作为沟通我国南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京杭大运河对于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促进沿岸城镇的发展以及南北经济的文化交流,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运河水神主要盛行于明清时期,故本书所探讨的“运河”主要指的是元明清以来的京杭大运河。

中国运河文化是运河区域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中华文化大系中南北地域跨度大、积累时间长、内容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按照其类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大运河物质文化(包括河道、闸坝、堤防、驿站、码头、榷关、桥梁、城镇等)和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文学、民俗、技艺、戏曲、音乐、舞蹈、武术等)。如果说区域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只是物化半物化的、浮在社会表层的文化现象,那么精神文化则是深层次的、最能代表区域文化本质属性的文化现象。在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中,又以水神信仰为主体的精神文化最具代表性。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区域不仅是一条繁荣的商品经济带,同时也是一条密集的水神祭祀带,祭祀各种水神的庙宇和祠堂遍布运河沿线的城镇和乡村。水神信仰的种类和对象十分庞杂,其中既有金龙四大王、黄大王、妈祖、宋礼、白英等

人格神,也有龙神、河神、泉神等自然神。此外,还有大禹、真武、三官等上古名人和神话人物以及镇水铁牛、龙形镇水兽、镇水宝剑等灵物信仰。河漕治理的现实需要、运军和商人的跨区域流动,促进了水神信仰的传播和盛行。频发的水旱灾害及其产生的严重威胁,也使得人们在灾害来临时,不得不求助于水神。水神信仰的主体涉及皇帝、河漕官员、漕军运丁、商人商帮、普通民众等社会群体,官方和民间共同推动了信仰的传播和发展。作为运河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在运河沿岸仍保留着众多水神庙宇及其遗迹。很多庙宇及其遗迹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当地乃至全国著名的旅游景点。对其开展相关研究,无疑可为当前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资源开发提供历史借鉴。

运河水神信仰作为运河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对明清国家的河漕治理活动以及沿岸社会民众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晚清以后,随着运河淤塞、漕运废止,水神信仰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基础,水神庙宇及其祭祀活动也逐渐销声匿迹,难觅其踪。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科学理念的传播以及政府的移风易俗活动,使得包括水神在内的神灵信仰活动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被视为愚昧、迷信的代名词。2014年6月,大运河成功申遗后,有关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但是,相比物质文化遗产,有关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形势却不容乐观。运河沿岸众多民俗信仰、戏曲音乐、文学艺术、民间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日趋走向消亡的窘境。在很多地方,人们往往重视对看得见的河道、闸坝、码头、城镇等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对较为抽象、不易看到的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则缺乏关注;研究运河民俗的相关著作对水神信仰的介绍也大多一笔带过或言之不详。本书的编纂无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憾。本书力求兼顾学术性和通俗性,在普及运河水神知识的同时,阐述神灵信仰与运河文化的关系。由于涉及地域广阔,再加上信仰种类繁多,限于本人的能力和水平,书中难免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还望方家和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胡梦飞

2018年9月

目 录

第一章 运河行船敬大王	1
一、金龙四大王崇拜	1
二、灵佑襄济黄大王	30
三、船家、渔民敬大王	38
第二章 慈航普渡赞妈祖	45
一、妈祖信仰起源及传播	45
二、淮安清口惠济祠的历史变迁	55
三、山东运河区域的妈祖信仰	61
四、天津的妈祖信仰	66
第三章 风调雨顺拜龙王	73
一、龙神信仰的形成及发展	74
二、江南运河区域的龙神信仰	76
三、扬州的龙神崇拜	79
四、山东运河区域的龙神信仰	82
五、微山湖渔民的龙神崇拜	90
第四章 江湖显灵话晏公	93
一、晏公的生平事迹	93
二、晏公信仰的兴起及传播	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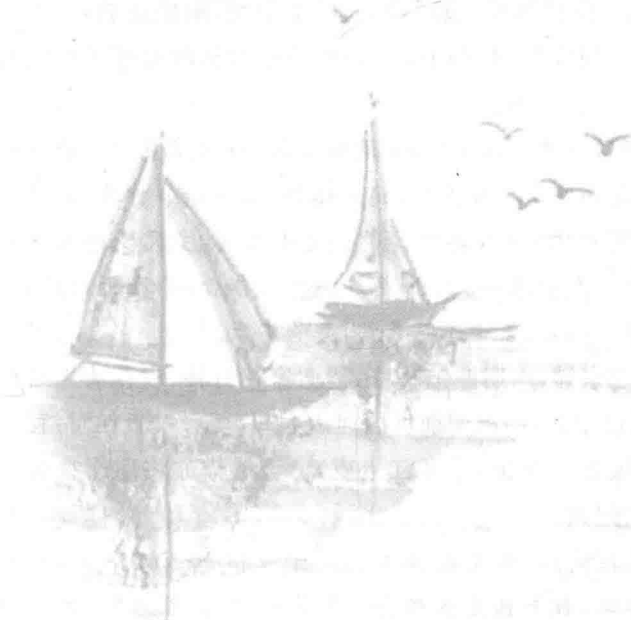
三、晏公信仰的功能及影响	99
第五章 显佑河漕祭河神	104
一、河神信仰的历史渊源	104
二、山东张秋镇的河神信仰	111
三、临清的漳河神信仰	118
四、济宁的河神信仰	125
第六章 治水功臣美名扬	133
一、上古治水名人	134
二、地方先贤和历史人物	138
三、治河理漕有功之臣	148
第七章 平浪祈雨赛小圣	159
一、小圣信仰的兴起和发展	159
二、天津盐运与小圣信仰的盛行	163
三、小圣信仰的传播及影响	166
第八章 湖漕显应康泽侯	172
一、康泽侯信仰的兴起及发展	172
二、湖漕治理与康泽侯信仰	175
三、民间的康泽侯信仰	178
第九章 利漕济运金总管	182
一、金总管的生平事迹	182
二、金总管庙宇的分布	183
三、金总管信仰形成的社会环境	188
第十章 彰灵卫漕张将军	193
一、张将军的生平事迹	193
二、明清文人笔下的张将军	194
三、明清官方史料中的张将军	196



第十一章 御灾捍患祀神明	199
一、高家堰关帝庙	199
二、淮安的吕祖庙和显王庙	201
三、高邮露筋祠	202
四、苏州水仙庙	206
第十二章 镇水灵物保平安	208
一、镇水神兽	209
二、镇水器物	218
三、镇水塔楼	219
附 录	221
主要参考文献	234
后 记	258

第一章

运河行船敬大王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区域是当时社会变迁最为剧烈的地区，运河在促进沿岸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治河活动也导致了水神信仰的盛行，为运河区域民间信仰增添了新的元素，成为京杭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重要表现。清人朱寿鏞《敕封大王将军纪略》一书记载了与黄河、运河有关的6位“大王”及64位“将军”。6位“大王”分别是：金龙四大王（南宋文人谢绪）、黄大王（河南偃师人黄守才）、宋大王（明工部尚书宋礼）、白大王（明汶上老人白英）、朱大王（清河道总督朱之锡）、栗大王（清河道总督栗毓美）。这6位“大王”的庙宇在运河沿线区域都有分布，其中又以金龙四大王和黄大王信仰最为盛行。

一、金龙四大王崇拜

金龙四大王崇拜来源于对南宋文人谢绪的神化。金龙四大王，名谢绪，南宋诸生，杭州钱塘县北孝女里（今浙江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安溪村）人，隐居在安溪下溪湾。谢绪兄弟四人，因其排行第四，读书于金龙山，故称“金龙四大王”。据说他是宋理宗皇后谢道清之侄，其先祖为东晋太傅谢安。其祖父名谢

达，字明远，业儒，屡试不中，隐居林泉，歿后显灵，吓退金兵，阻挡虎豹，托梦开井，敕封广应侯、淮浙提举。明成化《杭州府志》记载祭祀谢达的灵惠庙在钱塘县西北孝女北管下墟：

神姓谢，讳达，业儒，屡游场屋不利，退隐林壑间，歿而显灵。宋建炎初金虜犯境，乡民彷徨，忽闻空中金鼓声现，旗旌振耀，显露谢公神号，金虜退遁，乡民赖焉，邻境屡有虎豹，不入其境。咸淳庚午元夕，乡民梦神云今岁当大旱，宜先开井浚源。夏秋果旱，赖井灌田成熟。自后，旱潦祈祷辄应。乡耆状于两浙运司，以闻赐额，至今子孙奉祠，灵响不衰。^①

《东山世系图》系谢氏之宗谱，由明谢钝纂修，清谢家福订补，现存清光绪十年（1884年）刻本。据该族谱记载，始祖谢衡世居河南太康，西晋太康年间，官至国子祭酒，典午南渡，迁会稽始宁东山（今浙江上虞）。该族谱亦将谢绪视为谢达之孙，对其事迹作了详细记载：

祖名达，宋敕封广应侯；伯名孟英，敕封五道十一相公；父名仲武，敕封司徒十三相公；叔名季略，敕封横充五相公。余弟兄四人，长名纲，善驾云致雨；次名纪，善制水往来；次名统，善兴风扬沙……太祖惊醒，遂传旨敕封纲为云仙一相公，纪为水仙二相公，统为兴风三相公，以绪为建功之首，查号金龙，因敕封金龙四大王，祖父伯叔又加追封焉。^②

据成化《杭州府志》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谢达是安溪下墟湾地方神灵，成化年间以前，与谢绪并无关系。谢达、谢绪同祀一庙的记载，出现于明代中期以后。万历《钱塘县志》记载灵惠庙：“在孝女北管下墟，宋祀谢达、谢绪，旱涝祈祷辄应。”^③明中期，官方多次掀起打击民间淫祠的运动。弘治元年（1488年），礼部尚书周洪谟上书云：“凡宫观祠庙，非有功德于民者，不合祀典，俱令革去。间有累朝崇建，难于辄废者，亦宜厘正名号，减杀礼仪，庶尽以礼事神之心。”^④作为地方神的谢达虽有官方“敕封”和保护乡民的“灵应”传说，但仍存在被官方取缔的风险。金龙四大王谢绪为国家崇祀的黄河与运河之神，为逃避官方的打击，

①（明）陈让等修：《（明）夏时正等纂：成化《杭州府志》卷三五《坛庙》，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75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481页。

②（清）仲学谔：《金龙四大王祠墓录》卷一《传志》，见《丛书集成续编》第59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669页。

③（明）聂心汤等：《万历《钱塘县志·纪制·庙》，《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192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273页。

④（明）俞汝楨编：《礼部志稿》卷八四《神祀备考》，见天津阁《四库全书》第198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08页。



谢氏家族主动将谢绪纳入谱系，借以提高家族的地位，增强信仰的正统性和合法性。^①

金龙四大王的原型谢绪经历了由人到神的神化过程。最早记载谢绪生平事迹的是南宋遗民吴县徐大焯的《烬余录》：

谢绪，会稽人，秉性刚毅，以天下自任。咸淳辛未，两浙大饥，尽散家财振给之。知宋祚将移，构望云亭于金龙山祖陇，隐居不仕。作《望云亭》诗云：“东山渺渺白云低，丹凤何时下紫泥。翘首夕阳连旧眺，谩看黄菊满新谷。鹤闲庭砌人稀迹，苔护松荫山径迷。野老更疑天路近，苍生犹自望云霓。”未几，国亡，绪北向涕泣，再拜曰：“生不报效朝廷，安忍苟活。”即草一诗云：“立志平夷尚未酬，莫言心事付东流。沧胥天下谁能救，一死千年恨未休。湘水不沉忠义气，淮淝自愧破秦谋。苕溪北去通流塞，留此丹心灭寇仇。”吟毕赴水死。^②

由以上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此时谢绪还只是一个有气节的文人形象，并非宋室外戚、重臣之后。

谢绪的形象真正由文人转化为水神，是在明代。明人徐渭（1521～1593年）年所撰《金龙四大王庙碑记》云：

王姓谢，名绪，宋会稽诸生，晋太傅安之裔也。祖达，某有兄三人，曰纪，曰纲，曰统。王最少，行第四，居钱塘之安溪，后隐金龙山白云亭。……元末，我太祖与元将蛮子海牙战于吕梁，元师顺流而下，我师将溃，太祖忽见空中有神披甲执鞭，驱涛涌浪，河忽北流，遇截敌舟，震动颠撼，旌旗闪烁，阴相协助，元师大败。太祖异之，是夜梦一儒生披帔语曰：“余为宋会稽谢绪也，宋亡赴水死，行间相助，用纾宿愤。”太祖嘉其忠义，诏封为金龙四大王。金龙者，因其所葬地也；四大王者，从其生时行列也。自洪武迄今，江淮河汉四渎之间，屡著灵异。^③

清康熙年间，由福建侯官人陈梦雷（1650～1741年）所编辑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对谢绪由人到神的经过亦作了详细的记载：

谢绪，达之孙也。元人外啮，谢太后中制于权奸，绪以戚畹，故恚尤切，

① 参见褚福楼：《明清时期金龙四大王信仰地理研究》，暨南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2～13页。

② （元）徐大焯：《烬余录·甲编》，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265页。

③ （明）徐渭：《徐渭集·补编·金龙四大王庙》，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98页。



建望云亭于金龙山巅，读书其中。……太后北辕。叹曰：“生不能图报朝廷，死当奋勇以灭。”作诗自悼，书讫赴水死。水势汹涌高丈许，若龙斗状，尸为不充，颜色如生，人咸异之。元末，预梦于乡人曰：“吾饮恨九泉百余年，今幸有主，越数日，黄河北徙，其验也。汝辈当归新主。明春吕梁之战，吾其助之。”丙午春，黄河北徙，九月，明太祖取杭州。丁未二月，傅有德与贼大战吕梁，见金甲神人空中越马横槊擒贼，众大溃。成祖议海道不便，复修漕运，凡河流淤壅，力能开之，舟将覆溺，力能拯之，神之显著于黄河特甚。嘉靖中，奉敕建庙鱼台县。隆庆中，遣兵部侍郎万恭致祭，封金龙四大王。^①

此外，《茶香室丛钞》《杭州府志》以及文人笔记《通俗编》《陔余丛考》《九曜斋笔记》《矩斋杂记》等著作中均可见到有关谢绪由人到神的转变过程及历代朝廷对其敕封的记述。

通观明清官方史料和文人笔记中有关金龙四大王事迹的记载，无非都是谢绪是宋室外戚、重臣之后，元末徐州吕梁洪大战时，曾骑马披甲助阵，协助明军大败元军之事。首先，据学者考证，谢绪是被钱塘安溪谢氏家族主动纳入谢氏家谱，所以并非外戚、重臣之后。^②其次，谢绪在吕梁洪“显灵”助战的说法带有明显的神话色彩，显系民间传说，多为当时文人和民众伪造。考察《明太祖实录》《正德《彭城志》、《成化《杭州府志》等史料，徐州吕梁洪、钱塘安溪均无明太祖敕封之事或敕建金龙四大王庙宇的记载。有关金龙四大王“显灵”徐州吕梁洪的传说，直到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才出现。这显然是后人附会之词，无非是想通过对谢绪形象的改造，以达到获得官方认可的目的。

明代以前并无专门的运河水神和漕运保护神。明朝定都北京，漕运成为封建王朝的经济命脉，“三月不至，则君相忧；六月不至，则都人啼；一岁不至，则国有不可言者”，真可谓“倚漕为命矣”^③。明代京杭大运河全长 1500 余公里，漕船航行其上，会遭遇诸多险阻，其中主要有江面风险、湖泊风险、黄河之险、徐州洪和吕梁洪之险、山东段运河过闸之险。漕粮运输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诸多艰难险

① (清)陈梦雷等辑：《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神异典》卷二七《西读河水之神部·纪事》，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60087 页。

② 参见褚福楼：《明清时期金龙四大王信仰地理研究》，暨南大学 2010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10～13 页。

③ (清)傅维鳞：《明书》卷六九《河漕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38 册，齐鲁书社 1997 年版，第 697 页。



阻,运河水神的出现成为一种必需。“自吕梁、徐州以达临清,凡两岸有祠,皆祀金龙四大王之神。”^①金龙四大王庙多建于黄河、运河沿岸,“其后拥护漕河,往来粮艘,惟神是赖”^②。明代前期,徐州黄河、运河交汇。由于借黄行运,黄河的溃决泛滥对漕运构成了严重威胁,再加上徐州洪、吕梁洪两处险段的存在,使得当时的徐州成为漕运最为艰难、河道治理最为频繁的地区。无论是肩负治河、理漕重任的河漕官员,还是从事漕粮运输的漕军、运丁,都对河神和漕运保护神信仰有着强烈的需求,故金龙四大王首次“显灵”在徐州吕梁洪并不是偶然。

正统、景泰年间为明王朝的多事之秋,外有蒙古入侵,明英宗君臣陷入敌手;内有黄河为患,阻断漕河命脉。继任的景泰皇帝在屡派要员治河不力的情况下,只好在虔诚崇祀黄河之神的同时,求助于曾经“显灵”助战的金龙四大王。自明初会通河开通,黄河的冲决泛滥给山东的漕运河道带来极大的威胁,每次黄河决口几乎都会导致张秋以南运道的阻塞,因而明朝中后期,朝廷治理漕河的重心大多在张秋至徐州之间。在每次实施治河保运的工程时,朝廷都少不了祈求金龙四大王的庇佑。明英宗正统年间,黄河在金龙口溃决,冲垮阳谷境内的护漕大堤,漫曹州、濮州、东昌,冲张秋,溃寿张沙湾(今河南台前县夹河乡沙湾村),坏运道,张秋一段运河浅塞不通,漕粮北运受阻。朝廷派大员前往治河,久无成效。景泰二年(1451年),朝廷特敕山东河南巡抚、都御史洪英与王暹协力治河,“务令水归漕河”。二位重臣来到张秋附近的沙湾,筹划调度,指挥治河,但因水流湍急,又溃决已久,决口随堵随溃,难以奏效。无奈之下,洪英与王暹只好上疏,力陈沙湾河道久溃难治,流急浪险,“石铁沉下若羽,非人力可为”,请求皇上允许“设斋蘸符咒以禳职”。景泰帝别无良策,又治河心切,只得命工部尚书石璞前往治理,并加河神封号。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河流渐渐微细,沙湾堤始成。于是,加封石璞太子太保,并于黑洋山、沙湾新建河神庙,每年春秋二祭。景泰四年(1453年)正月,河复决新塞口之南,“以沙湾累修累决,诏加封河神为朝宗顺正惠通灵显广济大河之神,命巡抚山东、刑部尚书薛希琏以太牢祭之”^③。景泰四年(1453年)四月,决口乃塞。五月,大雷雨,沙湾北岸复决,运河水入盐河,漕舟尽阻。七月,沙湾再次决口,“水皆东注,以致运河无水,舟

① (明)王琼:《漕河图志》卷六《碑记》,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版,第266页。

② (清)翟灏著,陈志明编校:《通俗编》卷十九《神鬼》,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351页。

③ 《明英宗实录》卷二二六“景泰四年二月乙未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4931页。



不得进者过半”^①。景泰六年(1455年)，“自沙湾抵临清，皆淤塞不通”^②。为消弭沙湾河患，敕建“感应祠”，祭祀大河之神，“其左祀护国金龙四大王及平浪侯晏公、英佑侯萧公，以春秋二仲及起运、运毕凡四祭，北河郎中主之”^③。到景泰七年(1456年)，景泰帝又听从左都御史徐有贞的建议，将金龙四大王从感应祠陪祀的角色中超拔出来，另建“金龙四大王祠”于沙湾，单独祭祀。沙湾的金龙四大王专祠是官方记载的山东运河区域出现的第一座漕河神庙。从这时起，金龙四大王就被纳入国家正祀之中。

随着明代中后期黄河水患的日益加重，金龙四大王的崇祀也更加盛行。嘉靖年间，皇帝敕令在山东运河重镇鱼台建庙奉祀谢绪；隆庆六年(1572)六月，派兵部侍郎万恭前往鱼台致祭，正式敕封河神谢绪为“金龙四大王”。与此同时，山东运河沿岸的城镇和乡村也陆续出现了许多地方官府和民间修建的金龙四大王庙，对漕运之神的崇拜由官方普及民间。

清朝继承了明朝崇奉金龙四大王的传统，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将官方对金龙四大王的崇奉推至顶峰。顺治二年(1645年)，“诏封河神为显佑通济金龙四大王，命河臣致祭”^④。金龙四大王从此被纳入国家祀典，成为清代国家正祀之神。康熙二十三年(1683年)南巡视察江南堤工，至桃源县众兴集，遣翰林院掌院学士孙在丰祭河神金龙四大王。^⑤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加封金龙四大王为“显佑通济昭灵效顺金龙四大王”^⑥。康熙四十三年(1704)时，“宿迁等县黄河金龙四大王庙皆入春秋祀典”^⑦。乾隆十六年(1751年)南巡，遣刑部侍郎钱陈群致祭于宿迁西堤金龙四大王庙。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加封金龙四大王为显佑通济昭灵效顺广利安民金龙四大王，建庙于江南徐州府”^⑧。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因陶庄开放引河工成，“命建河神庙，岁以春秋致祭”^⑨。乾隆以

① 《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一“景泰四年七月壬午条”，第5064页。

②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八三《河渠一·黄河》，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17页。

③ (明)谢肇淛：《北河纪》卷八《河灵纪》，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11页。

④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二六《河渠一·黄河》，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716页。

⑤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七“康熙二十三年十月辛亥条”，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册，第4068页。

⑥ (清)昆冈等修，(清)刘启端等纂：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四四五《礼部·群祀》，《续修四库全书》第80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

⑦ 《清圣祖实录》卷二一五“康熙四十三年正月甲戌条”，第6册，第5124页。

⑧ (清)昆冈等修，(清)刘启端等纂：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四四五《礼部·群祀》，第109页。

⑨ (清)嵇璜等：《皇朝文献通考》卷一六《群祀考下·直省专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64页。



后,嘉庆、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又先后 10 余次对金龙四大王进行加封。同治十一年(1873 年)奏准:“金龙四大王加封已至四十字,嗣后即以四十字为限,续有灵应,由各该督抚另行酌办。”^①光绪元年(1875 年)奏准:“金龙四大王封号,前定以四十字为限,今钦奉谕旨,照加封天后成案办理,即于四十字之外,再加封为显佑通济昭灵效顺广利安民惠孚普运护国孚泽绥疆敷仁保康赞翊宣诚灵感辅化襄猷溥靖德庇锡祐金龙四大王,以示优崇。”^②至光绪五年(1879 年),金龙四大王最后的封号为“显佑通济昭灵效顺广利安民惠孚普运护国孚泽绥疆敷仁保康赞翊宣诚灵感辅化襄猷溥靖德庇锡祐国济金龙四大王”。按照清代典制,神灵封号到 40 字便不再加封,金龙四大王的封号竟达 44 字之多,由此可见清朝官方对金龙四大王信仰的重视。

明清时期,宿迁境内先后建有 5 座金龙四大王的庙宇。民国《宿迁县志》记载,宿迁县金龙四大王庙在城西南,明知县宋伯华建;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河道总督靳辅改建于城西南堤上,有敕祭文。另外 3 座大王庙:一在中渡口,一在东关,一在小杨庄。^③除以上 4 座庙宇外,皂河龙王庙祭祀的主神也是金龙四大王。在这 5 座金龙四大王庙宇中,以城西南运河东岸的金龙四大王庙和皂河龙王庙最为有名。

宿迁城西南金龙四大王庙始建于明代隆庆年间。据万历《宿迁县志》记载,金龙四大王庙在新治西南。隆庆五年(1571 年),兵备道冯敏功、知县宋伯华督工,耆民刘整等建,春、秋二仲月致祭,住持陈惟忻。^④清康熙二十四年(1686 年),河道总督靳辅改建,庙内有康熙皇帝的敕赐祭文。康熙《宿迁县志》卷四《典礼志·祠庙》记载:

隆庆辛未,兵备冯敏功、知县宋伯华建。万历辛卯灾,参政郭子章、知县聂铨重建。万历丙申,知县何东风重修。入本朝,圯于河,康熙二十四年,总河靳辅捐资委原任宿迁丁艰、知县胡天龙改建于城西南堤上。大殿五间,勇南王张将军、九龙将军配祀,东廊房五间,西廊房五间,东西耳房各二间,戏楼三间,东西二门。御制看河阅工诗碑亭一座,门楼一座,红围墙

① (清)昆冈等修,(清)刘启端等纂: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四四六《礼部·群祀》,第 121 页。

② (清)昆冈等修,(清)刘启端等纂: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四四六《礼部·群祀》,第 123 页。

③ 参见严型、冯煦等修纂:民国《宿迁县志》卷四《营建志·坛庙》,《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 58 册,凤凰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23 页。

④ 参见(明)郭大伦、(明)陈文烛等修纂:万历《淮安府志》卷六《学校志·祠庙》,《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 8 册,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98 页。



一周，前木栅一周，木坊三座，影墙一座。^①

皂河龙王庙，原称“敕建安澜龙王庙”，位于江苏省宿迁市西北约 20 公里处的皂河镇。皂河原是发源于山东郯城县墨河的支流，向南流入京杭大运河，因水底土色发黑而得名。皂河镇的形成及发展与清康熙年间靳辅开凿皂河有密切关系。《清史稿·河渠志》载：“康熙初，粮艘抵宿迁，由董口北达。后董口淤塞，遂取道骆马湖。湖浅水面阔，纤缆无所施，舟泥泞不得前，挑掘舁送，宿邑骚然。”^②针对这一情况，康熙十九年（1680 年），时任河道总督靳辅“创开皂河四十里，上接沭河，下达黄河，漕运便之”^③。皂河一带亦因此成为南北漕运要道，逐渐形成市集，称为“皂河集”。清道光年间，曾任河南道直隶州判的卢盛芝回到家乡后，在集市周围筑圩防寇，遂有“皂河镇”的由来。

皂河龙王庙建立的具体时间，有多种说法，较为普遍的说法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民国《宿迁县志》记载安澜龙王庙在县西北皂河镇，康熙中建，雍正五年（1727 年）奉敕重修。^④皂河龙王庙内保存有一块康熙六十年（1721 年）的重建火神庙石碑。碑文云：“里中父老云戊子季春……公昏夜鼓棹黄河，自徐邳□□□见岸上仪从甚多，八座鼓吹，如人间贵官，询之曰火德星君□□□盖下一长吏□□□，天将明，旌旗冉冉入河神庙门，公遂登岸入庙，惟见火神遗像在焉。”^⑤河神庙创建时间虽不可详考，但却表明康熙六十年（1721 年）之前此地就已有规模较大的河神庙宇。雍正五年（1727 年），负责重修庙宇的河道总督齐苏勒亦在其奏疏中云：“臣酌估修建金龙四大王庙一事，臣谨查江南黄河一带所建龙王庙宇甚多，或地处沮洳，或庙貌狭小，均不足以壮观瞻，惟宿迁县西皂河之庙地势高阜，四面宽敞，庙貌轩昂，且介于黄、运两河之间，与朱家口相近。”^⑥由此可见，皂河龙王庙为原来的河神庙所改建，是重修，而非新建。这也表明最晚在雍正五年（1727 年）以前，皂河境内就已有河神庙宇的存在。

皂河集龙王庙的重修与雍正年间的“河清祥瑞”有关。众所周知，黄河因泥

①（清）张尚元纂：康熙《宿迁县志》卷四《典礼志·祠庙》，《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 41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41 页。

②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二七《河渠二·运河》，第 3773 页。

③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二七《河渠二·运河》，第 3773 页。

④ 参见严型、冯煦等修纂：民国《宿迁县志》卷四《营建志·坛庙》，《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 58 册，第 424 页。

⑤ 碑存皂河龙王庙内，笔者曾亲阅此碑，碑文由宿迁当地学者王晓风先生提供。

⑥ 《世宗宪皇帝殊批谕旨》卷二《朱批齐苏勒奏折》，见文津阁《四库全书》第 143 册，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40 页。



沙含量高,水为黄色,水色变清极为罕见,故清代官方多将黄河水清视作盛世吉兆。雍正四年(1726年)十二月初九至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初四日,官员奏报,陕西、河南、江南、山东四省境内1000公里的黄河清澈见底。“河清”事件发生后,雍正皇帝除遣官祭祀江南清河、河南武陟河神庙外,还敕令重修江南宿迁县皂河河神庙。由于皂河旧有庙基,重修较之新建开支较少。皂河庙修成时,虽然规模与河南武陟河神庙相同,但耗银仅三千九百九十九两。皂河龙王庙修成后规模宏大,齐苏勒奏称:“大殿添新补旧,复加修整,并改造大门、仪门、配殿,廊房外面通砌围墙,修造钟鼓楼以及建立牌坊,盖造东西道院。”^①所需费用由户部动用内帑抵销。此外,因淮徐道康弘勋在睢宁工次堵筑漫口时“屡见神明显佑”,“陡遇工险,随祷辄应”,愿捐家资三千两酬神,“以一千五百两交付江南宿迁县,以一千五百两交浙江钱塘县”,在庙宇附近购置田产“以备朝夕香火、不时修葺之用”。^②对此,雍正帝批复曰:“庙宇工程出于朕之诚意,毋庸捐助置买田地以为香火之资,康弘勋既有此愿,自属可行。”^③

据庙内雍正八年(1730年)所立《龙王庙祀田碑》记载,龙王庙共有祀田17顷之多。笔者在对宿迁皂河龙王庙进行考察时,曾亲眼看到这块石碑,石碑已残缺不全,碑文亦模糊不清,但祀田数量及立碑时间仍可辨识。据长期研究皂河龙王庙的当地学者王晓风先生介绍,龙王庙的日常管理由僧人负责,他幼年时曾听庙内最后一任住持戒明和尚讲述,庙中僧人俱来自承德避暑山庄,属佛教密宗,不忌荤腥。这种说法还有待考证,但庙宇日常管理由僧人负责,当确信无疑。

明清时期漕运、河工关系国计民生。皂河龙王庙处黄、运之间,又是雍正皇帝敕建,乾隆继位之初就极为关注。乾隆元年(1736年)八月,发布上谕:“朕即位元年,仰荷神明默佑,数处重大工程俱各循流顺轨,共庆安澜,朕心不胜感庆,理宜虔修祀典以答神贶。”^④乾隆亲自撰写祭文发往皂河庙祭祀,其《御制皂河龙王庙碑文》云:

我皇考世宗宪皇帝配天永命,康乂寰区亿宁,百神丕福于群黎兆姓,方望所及,秩祀惟虔,越若川泽灵祇默赞元化、大庇生民、孚应显著者,咸命有

① 《世宗宪皇帝殊批谕旨》卷二《朱批齐苏勒奏折》,见天津阁《四库全书》第143册,第40页。

② 《世宗宪皇帝殊批谕旨》卷二《朱批齐苏勒奏折》,见天津阁《四库全书》第143册,第44页。

③ 《世宗宪皇帝殊批谕旨》卷二《朱批齐苏勒奏折》,见天津阁《四库全书》第143册,第44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1册“乾隆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条”,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